

中華文史論叢

JOURNAL OF CHINESE
LITERATURE AND HISTORY

總第七十一輯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742
L357

中華文史論叢

總第七十一輯

李國章 主 編
趙昌平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中華文史論叢.(總第71輯)/李國章,趙昌平主編.
-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3.5
ISBN 7-5325-3389-1

I. 中... II. ①李... ②趙... III. 文史-中國-叢刊
IV. K207-5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3)第 014224 號

中華文史論叢

總第七十一輯

李國章 主編

趙昌平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、發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網址: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guji1@guji.com.cn

經銷處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

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25-3389-1

K·466 定價:15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廠聯繫。T:64063949

常務副主編 張曉敏
執行編輯 谷 玉
呂 健
秦志華

編輯部地址：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
上海古籍出版社內

郵 編： 200020

電 話： (021)64370011 轉

電子信箱： luncong@yahoo.com.cn

目 錄

道光朝士風與學術轉向

——讀沈垚落帆樓文集…………… 嚴壽激(1)

日本金沢文庫藏抄本《香嚴頌七十六首》…………… 羅時進(53)

辛棄疾《水龍吟·登建康賞心亭》的寫作年代…………… 吳宏一(67)

南戲《白兔記》考論…………… 俞爲民(87)

陳廷焯詞學綜論…………… 彭玉平(119)

唐至宋節度、觀察、防禦、團練、刺史體系的

演變…………… 余 蔚(145)

碑傳行狀和《宋史》列傳…………… 湯志鈞(183)

明朝的鹽法開中制度…………… 王 雄(201)

卜辭金文中的坯地及其相關地理問題初探…………… 沈建華(259)

金文“咸”字詞義、用法縷析

——兼論《尚書·康誥》等篇的年代問題…………… 陳 絜(272)

淺析新發現初修本《康熙字典》與定本之差異

以及王引之等校改本之修訂…………… 陸 楓(289)

中華文史論叢(第七十一輯)

麥都思《漢語福建方言字典》述論…………… 黃時鑒(318)

學術信息:大雅正聲與時代精神學術研討會在

澳門舉行…………… 黃勵瑩(339)

道光朝士風與學術轉向

——讀沈垚落帆樓文集

嚴壽澂

一、序說：士風二型

雙流劉咸忻(鑑泉)先生，近世通人，^①治史注重社會風俗與學術人心的趨向，尤有特識。其《唐士風論》云：

論唐以後之士風，常見其成兩類相對之形，一尚器量，一尚才氣。前者偏於柔靜，寬裕而失為依阿，慎定而失為拘情，至尋常而不足應變；後者偏於剛動，高峻而失為迂褊，發強而失為躁詭，能興作而每致僨事。二者互有長短，此之所長，即彼之所短，更相攻也。巨公長者闕閱之傳，多為前者；孤起特立踔馳之士，多為後者；而亦不盡然也。其於政治，前者多主因循，後者多主更變，似道家與儒家之分，然亦未可全以相配。蓋儒家雖方迂，又有謹守之習；道家雖圓柔，

又有洞達之風也。世又稱爲守舊與革新，亦未賅治，以圓柔與者推移，或協於新，而方迂者以異爲高，或近於舊也。今故止以甲乙表之。

甲風平世所成，而乙風多見於亂世。西漢之初，承戰國之餘，乙盛也。至武帝厲學官、取游士以後，甲漸盛而乙漸衰，直傳至於東京。其間乙盛者，僅兩京之末而已。然以其時用人不拘一途，故二者之勢，未至相懸。曹魏以後，專用門閥，甲風幾於遍矣。唐承南北朝之風，然屢經喪亂，故乙風亦間出可見也。(中略)人皆知唐亡於朋黨、強藩、流寇。朋黨起於科第，本爭勢利，亦由甲乙二風之殊；強藩、流寇之成禍，甲類有以致之，而唐之不早亡於強藩者，則乙類之力。故甲乙本不可以軒輊，而論唐則不得不稍軒乙焉。然自唐人習見言之，則常軒甲而輕乙。^②

上述兩段話，對於這兩類士風的源流正變，及其長短得失之由、成敗消長之幾，剖析得相當清楚。這甲乙二風，與曾滌生所謂“官氣”、“鄉氣”，約略相當。滌生《覆李黼堂[桓]》曰：

大抵人才約有兩種，一種官氣較多，一種鄉氣較多。官氣多者，好講資格，好問樣子，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，語言無此防彼礙之弊；其失也奄奄無氣，凡遇一事，但憑書辦、家人之口說出，憑文書寫出，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，尤不能苦下身段，去事上體察一番。鄉氣多者，好逞才能，好出新樣，行事則知己不知人，語言則顧前不顧後；其失也一事未成，物議先騰。兩者之失，厥咎惟均，人非大賢，亦斷難出兩失之外。吾欲以“勞苦忍辱”四字教人，故且戒官氣而用鄉氣之人，必取遇事體察、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。^③

鑑泉得之於史乘，滌生則得之於閱歷，二者的結論則大致相合，確是有識者所見略同。滌生願用鄉氣之士，可見當時官氣禍害的嚴重。

時諺所謂“萬事不理問伯始，天下中庸有胡公”的後漢胡廣（按：廣字伯始），可說是甲風的代表人物，有“拗相公”之稱的王安石，則是乙風的典型。“天下中庸”，乃後漢寬縱政治的產物。縱弛的結果，則是對官吏不行督責，任憑權勢階級虐民以自逞，以致羌亂、黨錮，接踵而起，迄於後漢之亡。^④而所謂“拗”，則是對大一統體制下官僚政治的實情瞭解不切，不顧多數人的反對而强行實施新法。殊不知要推行新政的理財、保甲諸法，不得不用吏，而若要用吏，就不能不監督，否則利未興而害先見。安石既不明此義，其新政的失敗，實是勢所必至。^⑤由此可見，甲乙二風的利弊得失，正如鑑泉所指出，因時地的不同而異，絕不可執著於一端。明季可說是乙風極盛之世。愛新覺羅氏代興，有鑒於勝國末造黨爭之禍，盡力扶甲而抑乙。到了道光末葉，甲風影響之廣、弊害之深，前代罕有其比。因此嘉道以降的有識之士，多軒乙而輕甲。烏程沈垚（子敦）的議論，尤為痛切。子敦一介寒士，坎坷終生，其言似難免有過當之處。^⑥但是道光朝士大夫風氣的敗壞，以及方迂高峻之士狀況的窘迫，即此可以了然。而清代學術由漢返宋，^⑦自經史轉而為經世，^⑧其中機括何在，亦由此窺見一二。

以下以沈子敦《落帆樓文集》中尺牘三卷為中心，^⑨旁參同時及前後士人的議論，以勾勒出當時官方士習的種種弊端，以及乙類士人對此的感受與議論，進而考察學術的轉向，探討士風與學風的關係。

二、從湯金釗、曹振鏞看道光朝官方士習

湯金釗(敦甫)，崇尚理學，嘉慶四年進士，道光朝官至協辦大學士，歷吏、戶、禮、工四部尚書，謚曰“文端”，乃當時所謂理學名臣。據魯一同所撰《湯文端公神道碑》，“自言官翰林時，布衣脫粟，後常不使有過。其學以治經爲務，主敬爲本。自明季姚江之學盛行，本朝諸儒矯之，遂成水火。公不立門戶，不爭異同。大約本明道敬義夾持而兼有取於良知即慎獨之說，以刻意礪行爲宗”。^⑩所謂“治經爲務，主敬爲本”，即是宗朱學；同時又“不立門戶”，有取於王學(所謂“良知即慎獨”，即是融合陽明、戴山[劉宗周]之論)；歸結處則在“刻意礪行”。凡此都是承清初陸桴亭(世儀)、張楊園(履祥)諸儒不爭門戶、惟重躬行之風而來。然而沈子敦有《記湯侍郎告門生語》一文，揭示了這位理學名臣“主敬”、“礪行”的底裏：

蕭山湯金釗侍郎，以理學名海內。震澤張生洲，侍郎江南鄉試所取士也，爲人守正不阿，依侍郎于京邸。會試不第，侍郎謂之曰：“君不能隨時，外人皆與君不合，即有授經之席，我亦不薦。夫以君之不合時宜，將安所容身哉？惟我愛才，能容君耳。君可留教我子。”未幾，又謂之曰：“我兒本習舉業，自君入我門，頗看理學書。少年人當專意進取，一有先儒迂闊之見橫梗于胸中，則進取望絕矣。君不知變通，亦已自誤，以教我兒，又將誤我兒矣。我留君課兒，爲舉業，不爲理學。君宜體此意。”歸安陳洪謨聞之，曰：“侍郎此言，

非天下之福。”^①

生洲乃張履(字淵甫)的原名,爲子敦摯友(《落帆樓文集》所載《與張淵甫書》共二十通,學術、交誼、社會風氣,無所不談,可見二人交往之密)。上述“湯侍郎告門生語”,子敦顯然得自淵甫本人,應當可靠。其意思是:少年人若多看理學書,必然以成聖成賢爲職志,整天講正心誠意,(按:所謂“先儒迂闊之見”,不就是道學家所樂道的“正心誠意”這一套嗎?)不能專意於八股時文的舉業。如此一來,豈非“進取望絕”?你自己篤信理學,不知變通,誤了一世的功名,那也罷了,今天還要以此誤我的兒子,我豈能不跟你說明白。可見這位理學名臣,絕不迂闊,極知變通,既得功名利祿的實惠,又有理學以爲名高。而在真正理學家看來,所欠缺的是一個“誠”字。^②少了“誠”,所謂“主敬”,所謂“刻意礪行”,只是肅其衣冠、嚴其瞻視的一副道學面目而已,內心究竟如何,則不可問。(按:前述《神道碑》“布衣脫粟,後常不使有過”云云之上,特加“自言”二字,可見魯通甫下筆自有斟酌,不是一味諛墓。)

然而正如《中庸》所謂,“誠者物之終始,不誠無物”。再怎樣裝飾門面,總有洩漏天機之一日。《記湯侍郎》一文又說:

侍郎室中壁障楹聯,盡英和相國手書。一門下士趨謁曰:“英相國書可謂精絕。”侍郎因指示佳處。其人曰:“相公書誠佳,然公何以懸之若是之多也?竊謂懸一聯猶可乎。”

這段文字,極爲冷雋,活現了“敬義夾持”的文端公的真面目。在道貌岸然的外表下,原來是這樣一副諂媚權勢的心腸。最後以門下士的話作結,真是既諛且虐。雖然如此,這位理學名臣對於國家大事,畢竟還是有見識,能秉公而行。據前述《湯文正公神

道碑》，鴉片戰爭時，道光帝“坐便殿，從容問公以廣事可付託者，公以林文忠對，坐是失旨”。明知道光帝不喜林則徐，還是力薦，可見他不是依阿取容，更不是逢君之惡，與道光初當國的曹振鏞相比，可說尚有老成謀國之心。

曹振鏞，安徽歙縣人，字儷笙，一字懌嘉，乾隆四十六年進士，官至體仁閣、武英殿大學士，軍機大臣，卒謚文正。陳其元《庸閒齋筆記》“董曹兩相國遺事”條曰：

董文恭相國誥、曹文正相國振鏞，嘉、道兩朝名臣也。文恭盛德偉望，朝野欽仰。嘉慶十八年，天理教匪林清遣賊入禁城爲亂，時上幸熱河，聞變，近臣有以暫行駐蹕之說進者，文恭力請迴鑾，繼以涕泣。而文正在京師，於亂定後鎮之以靜，畿甸遂安。時有無名子撰一聯嘲之云：“庸庸碌碌曹丞相，哭哭啼啼董大師。”二公聞之，笑相謂曰：“此時之庸碌、笑啼，頗不容易。”（中略）後二公皆加太傅銜。文正訐謖遠猷，小心翼翼，歷相兩朝，福壽近世無比。余與二公皆姻家，故熟聞之。^⑬

陳氏與董、曹二家皆爲姻親，所說遺事當可靠，記述的目的，自然是褒而非貶。但是從中可以看出，董、曹二人十足是劉鑑泉所謂“柔靜”、“慎定”的甲風之士。同時從“庸庸碌碌”、“哭哭啼啼”二語亦可見，當時人對這兩位相國的缺少陽剛發皇之氣，頗有譏刺。董誥爲人如何，姑置不論。曹振鏞當朝，小心則小心矣，“訐謖遠猷”恐未必。

同光時，甘肅皋蘭人朱克敬，著有《瞑庵雜識》一書，對嘉慶以降的史事，記載詳審，其卷四記曹振鏞事云：

道光初，曹太傅振鏞當國，頗厭後生躁妄。門生後輩有

入御史者，見必戒之曰：“毋多言，毋豪意興。”由是臺諫務緘默守位，寢成風俗矣。然太傅廉淡，亦有不可及者。陶文毅公澍總督兩江時，以商人借引販私，國課日虧，私銷自暢，至有根窩之名，謀盡去之。而太傅家舊業鹽，根窩尤伙，澍又出太傅門下，意頗難之。因先以書問太傅。答曰：“苟利於國，決計行之，無以寒家爲念。世寧有餓死宰相乎？”澍遂奏請解章，盡革前弊。^⑭

這一位當朝傅相，簡直就是“萬事不理”、“天下中庸”的胡廣再世。連責在建言彈劾的臺諫也都“緘默守位”，以“多言”、“躁妄”爲戒，若逢多事之秋，朝廷如何能群策群力以應變？日後內憂外患迭至，清廷舉措乖方，可謂有自來矣。然而曹相國亦有其長處，即“廉淡”。“太傅家舊業鹽，根窩尤富”，顯涉貪黷，似乎“廉”不到哪兒去。但一旦陶澍以實情相告，這位太傅的回答相當得體。他顯然知道，門人這次改革鹽法，朝廷視爲切己之事，^⑮豈可橫加阻撓？由此可知，所謂廉淡也者，明哲保身、不爲己甚之謂耳。貪錢不爲己甚，是爲“廉”；貪權不爲己甚，是爲“淡”；如此而已。

不過，己甚雖不可爲，勢位卻不可不固。羅雪堂冢孫繼祖（甘孺），今世博雅士，所著《楓窗三錄》，有“曹振鏞相度”一條，云：

世謂清嘉道以後朝野上下苟且泄沓之風，曹振鏞當國實成之。宣宗嘗大考翰詹，以左思《詠史》詩“巢林棲一枝”命題，衆多不得解，振鏞在側，宣宗顧問曰：“若知之乎？”對曰：“不知。”曰：“若尚不知，於彼何尤。”遂不加譴責。曹出語同官，並誦原詩不訛一字。或問：“何以在帝前言不知？”

曹笑曰：“知此何足道，不知亦無大失，炫己損人，吾不為也。”見姚永樸《舊聞隨筆》。姚氏記此，似服其相度。按振鏞以文學受知，涪正揆席，有整躬率屬、儀型天下之貴者也，詎當效小忠曲謹，以休休有容自詡耶？道咸以後，縉紳不學，伏獵盈朝，有自來矣。^⑭

按：所論甚為有見。所謂“相度”，從正面說，是“休休有容”；從反面說，則是東晉人所致譏於丞相王導的“憤憤”。^⑮（據陳寅恪先生，西晉末年北人南徙，建國於東吳舊壤，而江東實力則掌握在孫吳舊統治階級之手，王導的“憤憤”，乃“籠絡江東士族，統一內部，結合南人北人兩種實力，以抵抗外侮”，實為“民族之功臣”。^⑯）甲乙二風的得失，本不可一概而論。王導“憤憤”，為民族功臣；而曹振鏞身處乾隆以降甲風極盛之世，以休休有容自詡，只能是誤國。

一味休休有容，不知整肅綱紀，一旦有事，必致大局潰爛。桐城方宗誠（存之），咸豐初避洪楊之亂，遁跡窮山，著《俟命錄》十卷，對於嘉慶後官方廢弛，釀成糜爛之局，深有感觸，其言曰：

姜西溟[按：姜宸英字西溟]曰：“大臣之患，不在於強直果遂，任怨生事，而在於儒懦迂緩，名為蘊藉，而其實持祿苟容之人。漢之初，用申徒嘉、周亞夫，可謂慤矣，而天下卒以治。至於元成之際，任匡衡、張禹、孔光之徒以為相，卒至釀成衰亂，大盜乘之，遂以移國。”又曰：“才臣之取敗，禍在一時，庸臣得志而潛潰其國家，其禍乃見於數世之後。”斯言也，真有識之言哉！

又曰：

嘉慶初，朱文正公珪為相，嘗言天子當以寬大得民。武

進張編修惠言爭之曰：“國家承平百餘年矣，至仁涵育，遠出漢唐宋之上，吏民習於寬大，故奸孽萌芽其間。宜大伸賞罰，以肅內外之政。”文正言：天子當優容有過大臣。編修曰：“當進內治官府、外治疆場者。”嗟乎！編修可謂救時之論矣。又，汪文端公廷珍嘗曰：“省事寧人，乃為治第一義，但苟且縱弛以釀禍端，與愷悌優游以養元氣，有毫釐千里之殊，不可不深察而明辨也。”此言亦得大體。^{①9}

在清中葉甲風極盛之世，還要提倡“寬大”、“優容”，無疑是雪上加霜。方存之的評語，乃身經禍亂後深刻反思的結果，決不是平世文人的泛泛之談。

另一方面，庸臣的“有容”，有其限度，若事關自己的勢位，決不會輕易退讓。曹振鏞即為一例。同光時金安清所撰《水窗春曉》卷下“傾軋可畏”條云：

道光初，蔣襄平以直督同召值軍機處，上眷甚渥，曹文正憎之。琦侯[按：即琦善]降調，上忽問曰：“兩江乃重任，當求資深望重久歷封疆者與之。”曹對曰：“以那彥成為最。”上曰：“西口正多事，何能往？”文正不答。又少頃，上乃指蔣曰：“汝久歷封疆，非汝無第二人。”議遂定。襄平出語人曰：“曹之智巧，含意不伸，而出自上旨，當面排擠，真可畏也。”阮文達亦不為曹所喜，上一日偶問曰：“阮元歷督撫已三十年。甫壯已升二品，何其速也？”曹對曰：“由於學問優長。”上復問曰：“何以知其學問？”曹對曰：“現在雲貴總督任內，尚日日刻書談文。”上默然，遂內召。蓋曹素揣成皇帝重吏治、惡大吏廢弛也。^{②0}

這真是表面大度包容，內裏陰沉忌刻，而如此人物，卻得“文正”

的美謚，無怪士大夫風氣之日下了。

清末民初人，因此有以曹振鏞爲誤清者：

清世大官，謚文正者八人：湯斌、劉統勳、朱珪、曹振鏞、杜受田、曾國藩、李鴻藻、孫家鼐。八人中湯斌以理學，朱珪以學問，曾國藩以勳業，皆無人訾議。(中略)若曹振鏞則拘牽文義，挑剔細故，箝制天下人心，不得發舒，造成一不痛不癢之天下。洪楊猝發，幾至亡國，則曹振鏞之罪也。初宣宗倦於大政，苦於章奏不能遍閱，振鏞在樞府，乃獻策曰：“今天下承平，臣工好作危言，指陳缺失，以邀時譽。若遽罪之，則蒙拒諫之名。此後中外章奏，皇上無庸遍閱，但擇其最小節目之錯誤者譴責之，則臣下震於聖明，以爲察及秋毫，必無敢肆者。”宣宗從之。其嗣後章奏中，有極小錯誤，必嚴斥罰俸降革。中外震悚，皆矜矜小節，無敢稍縱，語多吉祥，凶災不敢入告。及洪楊難作，互相隱諱，莫敢上聞，至於屢陷名城，始爲奏達。皆曹振鏞隱蔽之罪釀成之。厥風濡染，以至晚清之將亡，在政府者尚循斯轍。當其得謚文正時，當世已有“不文不正”之謗，則振鏞之罪惡可知也。乾嘉以前，應制書雖工，仍滿紙碑帖字，詩亦有拗體者。其時雖號臺閣體，亦尚有雅氣也。自曹振鏞在樞府，挑剔破體帖字，不問文之工拙，但作字齊整無破體者，即置上第。若犯一帖字，即失翰林。海內承風，殿體書直成泥塑。士習闌茸，厭厭無生氣，皆曹振鏞所造成也。^②

只要不違條例，字面上不出差錯(“拘牽文義，挑剔細故”)，其他一切推諉朦混，遇事無人擔當。上至朝廷章奏，下至制藝書法，一概謹小慎微，厭厭無生氣。人心何由得以“發舒”，士習焉得不

“闔茸”？道光三十年初，宣宗去世，文宗（咸豐）繼位。曾國藩上應詔陳言疏，痛斥上下“相率緘默”的風氣，謂“十餘年間，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，司道無一人摺言地方之利病”。^②造成這樣一個“不痛不癢之天下”，當國的曹太傅豈能辭其咎，但說應由他負全責，則並不公允。因為有懲於明末的紳衿橫恣而抑制讀書人囂張之氣，^③本是曼殊一朝的家法。（然而其間亦有區別。康熙二朝士風，雖甲盛而乙衰，士大夫不敢像在明朝那樣，放言高論，目空一切，但康熙帝以宋儒性理之學培養士大夫風氣，雍正帝究心於吏治民生，大體上還可說是盛世。乾隆帝則一面屢興文字獄，抑制士氣，一面又未能如乃父之綜核名實，晚年寵信和珅，更為耄荒。於是盛極而衰，甲風之害日益顯著，到了道光時期，終至局面大壞。）

嘉道時人上元管同（異之）撰《擬言風俗書》，對此直言不諱，所說極為貼切：

我清之興，承明之後。明之時大臣專權，今則閣部督撫，率不過奉行詔命。明之時言官爭競，今則給事御史，皆不得大有論列。明之時士多講學，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。明之時士持清議，今則一使事科舉，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。大抵明之為俗，官橫而士驕。我國家知其敝，而一切矯之。是以百數十年，天下紛紛亦多事矣。顧其難皆起於田野之奸、閭巷之俠，而朝堂學校之間，安且靜也。然臣以為明俗敝矣，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，蓄人材。（中略）臣觀朝廷近年，大臣無權，而率以畏懦；臺諫不爭，而習為緘默；門戶之禍，不作於時，而天下遂不言學問；清議之持，無聞於下，而務科第，營貨財，節義經綸之事，漠然無與於其